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

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罗伯特·哈克特 赵月枝 著
沈 芸 周 雨 译

Sustaining Democracy
Sustaining Democracy
Sustaining Democracy
Sustaining Democracy
Sustaining Democracy
Sustaining Democracy
Sustaining Democracy
Sustaining Democracy
Sustaining Democracy
Sustaining Democracy



清华大学出版社

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罗伯特·哈克特 赵月枝 著
沈 芸 周 雨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此书以客观性为切入点和聚集点,从西方新闻体制、新闻哲学以及新闻与民主的关系的高度来探讨客观性的来龙去脉,并着重立足于美国、加拿大的社会现实和新闻现实。书中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新闻现象,以大量而翔实的材料对北美新闻制度、新闻思想、新闻实践以及北美特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对新闻客观性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而历史的评析的同时,本书还提出了全新的新闻哲学和新闻改革的具体措施。

Robert A. Hackett and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EISBN: 1-55193-013-7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Garamond Press Lt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204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本书防伪标签采用特殊防伪技术,用户可通过在图案表面涂抹清水,图案消失,水干后图案复现;或将表面膜揭下,放在白纸上用彩笔涂抹,图案在白纸上再现的方法识别真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加)哈克特(Hackett, R. A.),赵月枝著;沈芸,周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8

书名原文: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ISBN 7-302-10970-2

I. 维… II. ①哈… ②赵… ③沈… ④周… III. 新闻工作-研究-北美洲
IV. G21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8953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客 户 服 务:010-62776969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常雪影

版式设计:刘祎淼

印 装 者: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55×230 印张:16.75 字数:263千字

版 次: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10970-2/D·175

印 数:1~3000

定 价:32.00元

简介

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并不像它们所标榜的那样客观公正，这几乎是西方传媒学者的共识，为何新闻客观性还能继续在北美传媒中成为“不死的上帝”？北美庞大的传媒机构如何运转？北美传媒与社会生活，尤其与政治之间又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由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西方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就是这样一部深刻反思北美传媒的历史与现状，以深厚的理论为基础剖析北美传媒的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客观性——它引入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知识/权力王朝的概念，把新闻客观性定义为包括4个层面的新闻/权力王朝。客观性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既是渗透到从新闻体制、新闻理论、新闻伦理到新闻采写和编排各个领域的灵魂，又是一种文化形式和一套高度程式化了的操作性很强的程序。它跳出了一般关于新闻客观性分析只限于新闻能否达到客观的局限，而且以客观性为切入点和聚焦点，从西方新闻体制、新闻哲学以及新闻与民主的关系的高度来探讨客观性的来龙去脉，并着重立足于美国、加拿大的社会现实和新闻现实。本书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新闻现象——从主流到非主流，从19世纪初的便士新闻到目前流行于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从电报新闻到因特网新闻……以大量而翔实的材料对北美新闻制度、新闻思想、新闻实践以及北美特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对新闻客观性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而历史的评析的同时，本书还提出了全新的新闻哲学和新闻改革的具体措施。

本书从哲学、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社会学、新闻史、新闻文本分析等各个角度来剖析客观性这一新闻现象，真正体现了传播学多学科研究的视角。本书追溯客观性在启蒙话语中的哲学渊源，分析客观性与党派新闻、劳工新闻和便士新闻的历史关系，以及客观性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定义和重新定义、被挑战和被重新肯定，以生动的事例揭示了新闻客观性的社会意义——新闻机构、新闻记者、新闻源、新闻受众、新闻管理机构如何以它为手段来控制 and 协调新闻生产制作过程和解读过程。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分析，剖析了客观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政治性。

本书的理论框架既吸取了西方的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的精髓，又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新思潮十分敏感，极力跳出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定势和方法论。

本书渗透了民主意识和多元意识，它不仅批判了北美新闻客观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在更深层面批评北美新闻传媒反民主话语霸权体系，以及新闻客观性所依附的自由意识形态在 20 世纪末所面临的危机。对充分认识北美的新闻制度和新闻实践的实质，了解北美新闻理论与实践领域最新动态，评述目前西方传媒制度变革等最热门的话题都有积极意义。

序言

中文版

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中文版的出版比当初英文原著（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的出版更令我欣喜。虽然通过英文绕了个弯，但在学术旅途中我有幸找到了一位同行者，也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本书的合作者哈克特教授。此书中文版的出版使我实现了 20 年前留学加拿大时的第一学术心愿：揭开“新闻客观性”这一新闻学中的“不死之神”的面纱，为国内新闻理论、新闻政策、新闻实践与新闻批评界有相同兴趣的同仁提供有关北美新闻制度的一种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独到分析。在书中，我们超越了“新闻是否客观”和“新闻能否客观”这些新闻伦理与新闻实践领域的普遍命题，把新闻客观性作为一种新闻制度和新闻文化的形式来理解。我们采用跨学科的视角，以新闻传播理论、传媒政治经济学和传媒社会学为基础，引入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文化研究理论和话语分析方法，从新闻制度与北美民主政治制度的关系这一理论高度来分析与评价新闻客观性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对新闻客观性的全面剖析，我们不但力图提供有关北美新闻传播业的主要理论、政策与实践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图景，而且就新闻传播在当代北美社会里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以及新闻与资本、国家、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问题进行全面的反思。我们虽然立足于加拿大，但是我们的立论与分析，包括对一些具体事例的选取，都观照了整个英美传播制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和现实。

虽然本书属于理论，但是读者不妨把它当作以新闻客

观性为主角的有关新闻与当今北美民主制度何去何从的一段叙事来阅读。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闻制度安排和新闻文化形式，新闻客观性与欧洲启蒙民主话语以及英、美、加拿大的早期劳工新闻和商业新闻之间都有着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与组织结构上的历史渊源。它的理论思想与实践形式在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主要政治社会文化哲学思潮的互动中不断演变。它不仅植根于北美传媒制度中深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而且作为广泛的文化 and 政治资源在规范与协调新闻与公众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客观性制度的哲学基础已被后现代主义和相关社会理论所动摇，但它不仅维护着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话语霸权，为主导的传媒制度和社会话语权力关系提供了合法性条件，而且为 20 世纪 80 年代年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向右翼的市场自由主义转折提供了润滑剂。同时，它的普遍性、抽象性和规范性也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争夺话语权、影响新闻议程和公共话语意识形态跨度的象征性资源。

在我们的叙述中，北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新闻客观性制度面临着双重危机，而传统的自由主义新闻传媒理论规范性的核心概念，如新闻自由、新闻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新闻媒介作为信息的提供者、新闻舆论市场上的“消费者至上”等，已无法为摆脱危机和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在书中关注在客观性的范式之外促进北美传媒民主化的技术资源和传媒业内外部的社会运动等因素，包括互联网、公共新闻改革、另类新闻媒体和媒体民主化运动。虽然最终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抛弃客观性制度，但我们呼唤新的公共传播哲学原则的出现。

此书英文版是 1998 年出版的。书中关于传媒业所有

者的某些具体细节已成为历史，如曾经在加拿大报业独霸一方的媒介大王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不但已把自己的报业王国在加拿大的部分出售给新崛起的多媒体公司加西集团（CanWest），而且因为把上市公司当作个人的钱袋而遭美国法院起诉。然而，我们所揭示的新闻客观性的多面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更明显了。我们所描述的北美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新闻客观性制度面临的双重危机在后“9·11”的北美新闻和政治现实中也进一步加深了。比如，新闻评论家有关美国媒体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评论不断指责美国主流媒体的伪新闻客观性（Pseudo-objectivity）实践，认为它使媒体被动接受官方信息，成为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的传声筒。如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3年7/8月号就发表了长文，认为客观性新闻为懒惰和不深入调查提供借口，为“官方真理”的传播提供方便，使新闻界不敢与权力抗争，不敢把当权者不愿提及的问题——如伊拉克是否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到新闻议程上。套用美国政府有关颠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regime change）的政治术语，也仿佛是对我们书中把客观性定位为一种政治体制（regime）的回音，美国著名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2003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呼吁，“在国家首都出现的伪客观性……已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了”（Pseudo-objectivity in the nation's capital... is now overripe for regime change）。

与此同时，正如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所言，在经历了客观新闻和专业主义的高峰期后，美国主流新闻又大有回到党派新闻和鼓吹性新闻年代的迹象。赤裸裸的倾向性和表态性新闻俨然已成为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的法宝。比如，默多克旗下的福克斯新闻网

(Fox News) 以在报道中公开表达右翼观点而取胜于市场；为了迎合政府、广告商和传媒集团本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客观性的核心——新闻的独立性原则——不断遭到侵蚀。克雷尔频道 (Clear Channel) 广播公司下属的广播电台更是公开抛弃独立的原则，组织起支持美国在海外发动战争的民众集会。在美国，客观性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从来没有像在后“9·11”时代那样昭然若揭。在加拿大，商业利益对客观性的侵蚀，尤其是传媒业主对传媒话语权的支配，在过去几年中更有了令公众瞠目结舌的发展。在购买了布莱克的报纸王国并成为加拿大高度集中的传媒业的主要传媒集团后，加西集团 (Can-West) 要求旗下的 14 份都市报纸无一例外地刊登公司总部撰写的有关重大时政问题的评论，并要求所拥有的报纸在有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舆论一律，与公司所有者家族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保持一致。总之，国家和媒体所有者对话语权力的行使比以往更直接，加上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旨主义化，使北美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许，新闻客观性体制所依附的政治、传媒经济、哲学、社会意识形态条件已全面瓦解？

令人深思的是，与美国首都盛行的被认为是服务于权力的“伪客观性”情况相反，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则正是以客观独立为原则和武器，在有关伊拉克是否真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问题上与政府和官方“真理”进行了抗争。而回眸 2004 年的美国新闻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资深主持人丹·拉瑟则不得不为 CBS 在一则有关现任总统布什服役历史的调查性新闻中因调查不深入和用了第三者提供的假证据而公开道歉。而 CBS 新闻因为一则有意揭露布什的新闻而公开道歉这

一事实，又为美国右翼新闻批评家们重申他们普遍信奉的美国主流媒体有左翼自由主义或反权威倾向的信条提供了佐证。总之，有关新闻客观性的实践复杂多面，评论界对新闻客观性至今见仁见智：有人诅咒它的虚伪，有人悲叹它的式微，有人以捍卫它为藉口来影响公共舆论，更有人在客观性的旗帜下与影响媒体的外部政治经济权力进行抗争。

无须赘言，语境的不同决定了客观性与社会话语权力的关系在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实践中会与我们所分析的北美情景有所不同。在国内，新闻传播业遵守的是公开的党性原则，伪客观性对于权力的依附好像还不明显。在许多新闻传播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眼里，新闻客观性和以其为核心的专业主义可能还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更注重客观性精神与实践相对于现有新闻制度的解放性意义。然而，事实上，自从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一系列新闻理念与实践出现以来，国内新闻界对客观性的利用越来越自觉了，有关客观性的宣称在中国媒体中已不再陌生。比如，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的口号就是对客观性的某种宣称。这一宣称及其具体新闻实践正体现了在中国特定新闻体制下特定的新闻文化形式和话语权力关系。对这一宣称和这一宣称所指的具体新闻实践和在此宣称下播出的新闻文本及其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我们无法简单地贴上“开放与保守”、“解放与压制”、“真实与虚伪”等二元标签。更有意义的是对这一宣称及其实践进行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并进一步对相关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和意识形态批评，从中揭示一个转型社会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话语权力关系。如果此书对国内同行认识北美的新闻与政治制度有所帮助，对发展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学有所启发的话，我就心满

意足了。

此书由哈克特教授和我断断续续写作多年。当时我还在读博士，记忆中有凌晨一点多钟抱着刚刚睡醒的几个月大的女儿在计算机前改书稿的片断。翻译过程也可以说是费尽周折。我非常感谢沈荟与周雨两位译者，她们在不同的情境下为翻译此书作了各自的努力：周雨从曾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她的老师那里得到此书后，翻译了第一稿，并到加拿大与我探讨过翻译中的问题。沈荟在周雨初稿的基础上逐字逐句重新翻译、整理，输入文字，并就翻译中的一些具体疑点与我逐字逐句进行了商榷。她还就某些关键词语的翻译请教了国内传播学界的权威，然后把结果告诉我，使我学会了一些英语学术词汇的准确的中文表达方法。她对学术认真纯粹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作为懂中文的原著者，我可以说，此书翻译的质量是一流的。我也十分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此书的出版所作的一切努力。同时，我还要真诚感谢郭镇之教授，她不仅在我、译者和编辑之间做了不倦的牵线搭桥工作，而且仔细审阅了我这篇中文序言的初稿，不仅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还修改了我中文表达中许多生硬与不流畅之处。最后，此书的英文原著出版商，多伦多的加里蒙德出版社免费赠送了他们所拥有的中文出版版权，特此表示感谢。

赵月枝

2005年1月于温哥华

序言

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新闻客观性与民主

新闻可以说是公众获取知识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公众领域中已占首要地位，而新闻则是大众传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公共领域就是“人们就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流信息和观点，以便形成公众舆论的社会生活领域。”¹

在北美，新闻实践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受我们称之为客观性体制的制约。我们称之为政体的客观性体制——一种理念、假设、实践和制度的集合体已变成固定的公共哲学和自我调节的一种假设形式。利益集团、社会活动家们及政客们运用客观标准就公众议题进行协商，新闻记者将之当作提高他们职业地位的资本，广告商和传媒公司则发现可以用客观标准这个有用的工具尽可能地提高其商品的市场到达率和可信度。客观性已成为一种有其自身生命力的文化形式。

反过来，客观性体制与民主、公共责任、公共生活及公共利益等重要问题有割舍不断的联系。正如加拿大皇家报业管理委员会在 1980—1981 年所说：“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相信，一般而言，报业乃至整个大众传媒对公众所负有的责任与其他行业不同。”² 换言之，加拿大人普遍相信新闻除了在市场上取得自身的经济效益外，还应有其他的追求。因此，作为对民主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机构，人们普遍期望新闻媒介能在维护公众利益方面发挥作用。

在加拿大，新闻发挥功能的模式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的管理模式有着长远而紧密的联系，并且普遍而言，北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其庞大的传媒集团，也同新闻业的社会实践与文化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闻事业与大众传媒机构，因而也背上了维系它们所倡导的某种“民主”的重负。

然而，民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联邦主义或者分裂主义等政治概念不同，民主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并被广泛接受。它简直就是一个令全世界都欢呼叫好的褒义词，而它的对立面则是诸如专政、法西斯主义之类令人厌恶反感的贬义词。但是真正引起争议的却是民主的本义，即它的确切含义。

政治学家认为有多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和制度都能称得上民主。C. B. 麦克福森 (C. B. Macpherson) 在 1965 年为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所作的精彩广播演讲中，概述了战后世界上存在着共产主义、不发达和自由主义三种民主形式。³ 在自由主义民主传统内，他后来为民主归纳了几种不同，甚至是对抗关系的阐述：保护公民不受他人和国家专制政府的残害，促进个人品格的完善及公民意识的发展，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保持政治稳定，促进广泛直接的政治参与。既将民主本身作为终极目标，又作为建设一个更加人道和平等社会的手段。⁴ 新闻的客观性体制与自由民主的平衡模式紧密相联（平衡模式即竞争的精英的统治论），从而，相对排斥了其他那些强调维系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和社会平等的模式。⁵

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机构，人们希望新闻传媒按一定的标准来发挥其职能，例如，

- 出版自由：从历史上说，这个概念的最初意义是指不受政府的审查控制，但也指不受私人利益集团或过度集中的私人权力的不良影响。

- 平等和公正：社会上的各种声音都应有均等的，通过传媒系统向更多的公众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观点的机会。

- 社会秩序和团结：即使是最多元的民主也需要某种程度的意见与价值观的一致，公共传播对于建立和保持这种一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能明显地起到推动“公民”话语的特殊作用：人们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得到某种和解。⁶

人们虽然普遍接受这个价值，但是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和它们相互之间妥协的程度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色情问题，社会保守人士认为它对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造成威胁，女权主义者认为色情会对男女平

等的追求造成威胁，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政府的审查才是最大的威胁。至于如何阐释和实施这些标准，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有人觉得平等的基本含义就是每一个政党都应享有均等的传媒时间，而有些人却认为传媒时间应与某个政党目前在社会上所拥有的支持率成正比。

私营机构或公共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这些价值标准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新闻媒体为私人所拥有，但是也有许多西方国家建立了公共广播系统，从事商业广播系统所无法达成的文化传播事业及其他目标，而这是商业广播公司无法做到的。由于长期面临美国的文化侵袭，加拿大创立了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其主旨是建立一个能与其疆土相匹配的公共领域。也正是由于新闻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甚至连美国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也以广播频道资源有限等为理由，根据公众利益规范广播电视媒体。鉴于新闻媒体的公共职能，许多国家给予私人媒体许多优惠，如瑞典的新闻补助金政策、加拿大的免税政策、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也破例让作为竞争对手的报纸共享资源。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些优惠政策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润之间起到了一种明显的平衡作用，同时也很好地协调了政治与媒体制度中的自由、平等和秩序这些价值关系。

当然这种表面上的平衡关系也常常遭到非议。在过去 30 年的时间里，保守人士指责媒体有“左倾自由主义”倾向，而进步人士则认为媒体是主流企业和政治机体的组成部分。⁷近年来，新闻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在新闻独立和多元化，以及为了追求这种独立和多元化如何去维持公共政策和私营媒体之间合理的平衡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最显著的是在 1995 年和 1996 年期间，北美传媒业中出现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亿万元巨头，在美国出现了疯狂的并购现象，包括迪斯尼公司吞并大都会/ABC 公司，西屋兼并 CBS 以及时代华纳公司接手泰德·特纳的 CNN 王朝。美国四大电视新闻机构如今成了一个巨大的联合王国，其业务从有线电视、出版、电影、多媒体娱乐，扩展到

金融、交通、核动力及军用产品的生产。本·巴格迪坎曾预言，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有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将被六大企业所独霸，此言一语中的。⁸

加拿大传媒公司亦追随美国的步调。罗杰斯电缆公司已吸收了麦克林·亨特（Mclean Huntel）出版业，报业大王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的霍林格公司以惊人的速度购买报纸。以至于加拿大每天所出售的每百份报纸中，有43份是属于霍林格的。这种集中的程度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传媒的集中并不囿于国界与市场。一个为少数纵向联合的多媒体公司所统治，拥有很高准入壁垒的全球性市场正在形成。⁹ 国际传媒的垄断是全球政治、经济、技术转型的一个方面，这包括通过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样的方式实现国际资本流向的自由化，传播媒介的数字革命和技术融合以及公共财政危机。这场有时被称之为全球化的大变革给新闻和民主带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危机。

政府应从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对传媒巨鳄进行管理，但即使是极微薄的努力政府也普遍放弃了，这就助长了传媒权力的集中。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电信法更是加剧了这种听之任之的现象。尽管这个法令是当代最重要的联邦法律之一，但它们的通过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更谈不上辩论。它放宽了电视网规模的上限，基本上撤销了对同一市场不同类型的传媒所有权的限制。

加拿大最近的电信法规的改革为更进一步的国际传媒联合铺平了道路。同时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由于联邦政府大幅度削减经费，在10年的时间里丧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或许更令人吃惊的是缺乏有效的新闻出版政策。1996年霍林格公司接收了全国最大的连锁报业萨斯汉姆公司（Southam），而联邦自由政府却对此不以为然。事实上，竞争法的监督者事前就同意了这次接收。这与1980年的情景大相径庭：那时候只有两家较小的报业公司涉嫌兼并，即便如此，也导致了联邦政府的调查与指控，尽管政府的法律诉讼最后没有成功。

这些传媒企业和公共政策的显著改变却被冠以消费者的选择、给受众以权力，需要更大的公司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上竞争等美丽词藻。这些声称一直被宣扬，其声调远远高于其他更为可能的潜在后果的表述：对公众的责任感的下降、独立的新闻与商业利益不断升级的冲突，更多的兼并，不断加剧的集中和规模扩大的同时伴随着裁员及缩减开支（downsize）。¹⁰有关新闻媒体的代表性、责任感、多样化，构建一个独立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等这些老问题具有了新的紧迫性。在过去，新闻确立已久的关于客观性、公正性和平衡性的标准起到了使新闻业的公司式所有权合法化的作用，或者至少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媒体组织结构转移到了新闻实践上。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是，控制着公众议程并隐藏在客观性背后的巨大的潜在私人权力，正危害着政治民主。

传媒所有制和政策中的新变化也许可以被认为等同于一场非暴力的政变。这一比喻令人联想到传媒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联系——通过公共政策和市场关系而进行的公众想象力的控制（colonization of popular imagination）与社会资源的配置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言，这里的关键是对“意识的垄断”——国家象征性资源和话语权越来越被意识领域里的“少数几个大商业公司所垄断”。¹¹

但是把这种变化比作政变不仅在意义上有限，而且令人误解。政客们可能是害怕得罪传媒巨头而管制媒体，可也并未发生国家权力的正式变更，而且我们的政治领导们也还有被推向一个不同政策发展方向的潜在可能。更关键的是，传媒在公众议程上的权力也并非上面强加的。新闻和政治的社会实践、文化意义和公众政策的形成，会受到少数传媒巨头或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意图或操纵的限制，但不会沦落到完全体现这些意图或操纵的地步。如果没有观众和选民的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许的话，他们的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激起新闻的危机感的并不仅仅是媒体的集中，也因其他的一些迹象。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新闻传媒的尊重正在下降，这种状况

在美国尤甚。市场调查显示，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分离正日益加剧，尤其是年轻人，对大众化的传统新闻媒介不屑一顾。当代传媒文化，尤其是电视及其娱乐需求占据主导地位，似乎正侵蚀着那些一度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多么不切实际）的分界线，传媒所创造的形象与社会现实、新闻与娱乐、事实与意见、新闻编辑室与一味牟利的统计专家，分界线正在逐渐消失。在政治中，我们看到公共领域的破碎、悲观怀疑的增多和对主流政治的参与意识的下降。有些人认为，北美公共民主生活能否生存已经成了问题。这些发展变化不仅与政治和文化，而且与经济和商业息息相关。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的“政权”（Regime：政权、政体、体制、王朝）隐喻由来已久但说法不一。在日常用法中，也包括新闻报道中（并非巧合），“政权”通常只一个特定的具镇压性的政府，政治学家们则更多将此术语中性化，并经常用它来指代各类政府。但这个术语在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中亦被使用。20世纪70年代，已故法国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即在书中论述过“话语性体制”这一说法——指权力如何与知识叠盖，不是从外部直接地实行审查或高压统治，而是通过标准和实践间接地从内部来统治言论的形成。¹²在一个特定的组织环境中，不论是科学、医学、精神病学、法学还是新闻学，这些指导标准可以决定哪些描述是合情合理的，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真实的。

一个相关的用法是苏格特·拉西（Scott Lash）的“意义产生体制”概念。¹³拉西认为这个概念有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是“文化经济”，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所依赖的关系和机制；一种是“意义的生产方式”，一个能使文化产品对其使用者具有意义的典型途径。拉西和其他理论家还区别了这些看与知的方式，例如，话语的与形象的、现代主义的与后现代主义的，认知的与审美的等。

我们自己使用“政权”隐喻，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上述的每一种用法。¹⁴通过使用这一术语我们想指出在新闻与社会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联系。权利的确可以从“外部”强加到新闻中，来自